

邵燕祥 钱理群 朱铁志 联袂推荐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走过 带伤的岁月

星星读史

一个作家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立场  
要清醒 要有担当 要讲些真话



# 走过的 带伤的岁月

毕星星◎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带伤的岁月 / 毕星星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24-10541-4

I. ①走… II. ①毕…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8767 号

## **走过带伤的岁月：星星读史**

---

**作 者** 毕星星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 (010) 88203378

---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开 16 印张 20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541-4

**定 价** 34.80 元

---

# 前　　言

## 大器晚成毕星星

丁东

星星兄长我两岁，近几年笔下妙文迭出，名声走出了娘子关，在中国的天南地北影响越来越大。之前有《坚锐的往事》在上海出版，今年《走过带伤的岁月》一书又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让我做序，感到十分荣幸。

我写下“大器晚成毕星星”这个题目，马上就感到，这与事实不尽吻合。因为比之一般的文化人，毕星星不是成名太晚，而是太早。“大跃进”年代，他才 10 岁，还是在校的小学生，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小诗人”。在《谁还知道李希文》里，他回忆过这段经历。“文化大革命”中，他参了军，因为笔杆子好，被调入北京军区写作组，专事写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参加了刚刚恢复的研究生考试，已经录取，阴差阳错又放弃了学业的深造，来到山西作协担任编辑，一干就是 30 年，直到退休。就步入文坛来说，他比同龄人先行一步。但是，山西省作协这个单位比较特殊，成功与否，在这里有特殊的含

义。如果在一般地方，能发表几篇作品，在周围有点小影响，就算是成功人士。但山西作协虽然只有几十号人，在全国知名者竟然超过半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这些 20 世纪 40 年代成名的老作家自不待言，20 世纪 80 年代，成一、郑义、柯云路、张石山、李锐等小说作家“晋军崛起”，先后名传遐迩，赵瑜的报告文学也风靡文坛。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谢泳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重新挖掘，又为学术思想界刮目相看。所以，成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读者的喜爱、同行的认可、市场的接受，才算修成正果。按照这个标准，毕星星奋斗到花甲之年，方觉渐入佳境。

成名过早，容易失去继续攀登的动力。毕星星的同龄人里，有太多的作家年轻时一举成名，便沾沾自喜，陶醉在成功的光环里，不再吸收新知继续前行。晚来的成功对于文化人来说，不是幸运，却能产生另一种后果，就是激励你不断追求，自我超越。那些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伤痕文学”潮流中的弄潮儿，曾经争相破题，闯入当代中国的种种言论禁区，暴得大名。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学乖了，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了，于是公众从他们那里再也听不到值得期待的声音了。人们看到的现实是，以作协系统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界，与国运民瘼已经渐行渐远。长期的未名状态，促使毕星星一直没有放弃批判的目光。但由于仍在作协系统供职，保持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在原来的圈子里不免感到日渐孤独。于是，他跳出了主流的文学圈子，另辟蹊径，寻找同道。他发言的平台，也由文学性媒体转向公共性媒体，诸如《炎黄春秋》《随笔》《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杂志和报纸。活跃在中国公共领域的更多的是学者和记者，与他们相比，毕星星的文字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老道、凝练、幽默、传神，可谓熔美文与批评于一炉，合叙事与思辨于一身。这就使毕星

星的文字在公共领域独树一帜，为编辑们所欢迎，也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

从时间的维度看，毕星星的写作领域上触民国，下抵当今。在评说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热点事件时，他往往要参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活经验，有了这种对比，观察现实就别有一种沧桑意味。从空间的维度看，毕星星的体验上接京城，下通地气。虽然他生活的重心在山西太原，但他的家乡是晋南临猗农村，参军以后到外面工作，一直保持着与家乡的密切联系，每年都要回乡住些时日。他的女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史学研究，所以每年又要到北京住些时日。同时拥有对乡土中国切实的感性认识和全局性的文化视野的作家学者，在中国不多。有宏观视野的作家、学者，难有真切的基层体验；有基层体验的地方文人，往往难以具备全局视野和历史高度。兼备两头，成为毕星星的优势。他从自己，从身边，到家族，到村庄，到朋友，到他所接触的各色人物，一一以新的目光打量；看出了别样的色彩。他自觉地挖掘乡间生活和基层人物与大时代的深层联系，让这些容易被忽视和埋没的细节鲜活起来，成为大历史的缩影。他对地方戏剧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政治的重重纠结，是中国戏曲的一大特色，他在这一方面的开掘，更是达到了独有的深度。

《坚锐的往事》出版以后，我曾说，这只是他浮出水面的起点，好戏还在后头。本书就是这出好戏新的一幕。

# 目 录

<b>前言</b>	1
<b>第壹辑 警钟为荒诞而鸣</b>	1
旋生旋灭的《民国暂行报律》	2
谁能想到冼星海出身疍民	6
秋瑾与铁姑娘队	9
1951 年的上下级关系	12
1958 年一个乡村的红色编写团	19
种出来个忠诚	22
“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	25
下落不明的杧果	33
文化工作危险论的源流	36
美女何以去杀猪	40
与吴钩谈清代禁戏	44
样板戏的同辈近亲	47
所谓十年磨一戏	50

样板戏的改名行动	55
样板戏的笑话	58
复排革命样板戏必须不走样吗	61
一个人的地震记忆	66
拷问牺牲	78
1985 年的“按得票多少为序”	87
恶师三人行	96
<b>第貳辑 寻找书写的意義</b>	105
孙中山在松江的马桶事件	106
“五四”运动中的警察执法	109
遥想当年中国科学社	113
钱穆、钱伟长叔侄记忆里万恶的“旧社会”	116
读《高岗传》	122
“谁的语录，我儿的语录”	127
《三上桃峰》和它的作者们	131
北岛的“卧底”话题	144
《中国在梁庄》的超越常规写作	152
冷眼平心看大家	156
一个年代的背影	161
出一本收版税的书	165
寻找纪实书写的意義	169

## 第叁辑 我们默认了什么

173

可怕的吃饱穿暖	174
要在“无意于感人”	180
西部劳模现象的另一种思考	187
想一想我们默认什么	193
哪里去了，中国大学生	197
国家庆典：仪式表达要不要创新	201
摸一摸奥巴马的头	204
领导讲话的文体属性	208
特权写作的标本	211
蹲点“三同”的历史命运	216
梁中堂和他的计划生育特区	220
我为什么在城里随地吐痰	22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大革命”记忆	227
公审公判大会请选别的地方	230
尊重穷人是正派社会的修养品格	233
乡村裂变的缩影	236
后记	243

第壹辑

警钟为荒诞而鸣



## 旋生旋灭的《民国暂行报律》

民国成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大清报律》。1912年3月2日，旋又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

《民国暂行报律》表明，新生的共和政体对报业发展非常重视，但是其中对报界的约束也是十分明显的。报业管理隶属内务部，约法规定：

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否则不准发行。

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调查失实，污秽个人名誉者，被污秽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秽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民国报律对于报业的约束，除注册外，主要是惩戒造谣生事，报道失实，侮辱他人的行为。对象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公民个人。破坏共和，坐以应得之罪。污秽他人名誉，经诉讼课以惩罚。即使现在看来，这些规定，也并不过分。

临时政府没有想到，报律一旦公布，立刻遭到报界强烈反对。报界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罪与非罪、违法与非法的表达含混不清，给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留下了空间。二是关于立法主体资格。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制定颁布法律，属于越权。上海的《申报》《时报》《时事新报》

《神州日报》《大共和报》《民报》等联名致电孙中山，一致抵制《民国暂行报律》。电文认为，政府未立，国会未开，内务部越权拟定报律，有超越权限的冲动，报律指责的破坏共和，实际上是抵制报业监督。“今杀人行窃之率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民国新造民诉法、刑诉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先立报律，也可以看出，政府官员还是习惯防民之口，一旦确立政权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舆论。

孙中山得到消息以后，立刻下令撤销了报律。他指出：“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宣布的《民国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中山先生认为，审查这三章条文，有的属出版法所记载，有的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如果特别制定一个报章法规，反而破坏了立法的统一完整。“民国以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会议议决。”

民国初年《民国暂行报律》的旋生旋灭，显示了报界的力量，这是报业同人团结抗争的结果。权力如果没有明确限制，一旦有可能越界，它天然倾向于越界。报界同人首先对权力高度警惕，这是那个时代非常可贵的前瞻眼光。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近代已走过了 50 多年的转型之路。上海、广州、北京开始成为全国新闻中心，各大商埠信息流动畅通，报业发达。当时的报业人员已经确立了牢固的新闻自由思想。从电报到报纸，中国的近代新闻传播是从欧美学过来的，但新闻自由的观念没有边界，反对新闻管制，这是近代民主国家的一致共识。

孙中山的开明，是取消《民国暂行报律》的关键。中山先生顺从民意，践行民主制度，身体力行，堪称领袖风范。须知在民国初年，

内务部制定这样的“约法三章”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纤笔一支，十万毛瑟精兵。辛亥革命中，报业制造舆论，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但当时的报纸也是谣言满天飞，好多报业人员不太重视新闻真实和街谈巷议的严格区别，新闻传播中时常有夸大渲染的不实之词。例如书报转载张勋的小妾被捕，革命党将其关押，任人参观，收取门票，事实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传言。底层民众对革命的隔膜无知，也同样引发了许多传言。报纸信以为真，有闻必录，报业的新闻质量并不是很好，约束整顿不是没有道理。如何制止谣言传播？中山先生不主张钳制舆论，制裁报馆。政府相信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纠错能力，开放言论只会使虚假信息无处藏身，封锁信息，只能让民众选择相信流言蜚语。即令报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山先生毅然决然保护新闻自由，不做那种立法施禁的荒唐事。这是近代国家领袖的政治眼光。

民国初年，没有党禁，也没有言禁，一切都是可谈的，所有人都可以批评斥骂的。从辛亥革命那时起，中国的报人就形成了言论自由的共识。言论自由的核心含义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批评各级官吏，自由地就公共事务或者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即使言论与事实不完全一致，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民国暂行报律》的短命说明，20世纪初中国人就明白，言论自由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针对私人的言论，但也绝不意味着政府想要怎么限制就怎么限制。

民国几十年，言论自由反反复复，不进则退。就在1913年2月，陆军部要求取缔各报登载军事外交消息，又一次引发了新闻界上书请愿。“二次革命”以后，许多进步报刊遭到查封，言论自由的主张依然曲折顽强地表达。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又一轮

言论自由论争风潮。1934年国民政府对报刊实行“事先审查”，以“预惩制”代替“追惩制”，同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同年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检查官在审查中随意删改，蛮横严苛。比较一下，新闻环境步步恶化，实在还不如民国初年。

## 谁能想到冼星海出身疍民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世代疍民。

疍民之家也叫疍户，这个称呼，今人多不用了。它指的是福建、广东近海一带的贫苦船工。这些人在陆地上没有家，世代生活在海上，靠打鱼为生，所有家当就是那一条船。家户吃在船上睡在船上，官府禁止他们登陆定居，改换职业。他们的子弟不许读书考试脱离原籍原业，也不许他们和“良家”通婚改变身份。这是一批被驱赶到海上的人家，除了进港交易，他们一般不得靠岸，终身在水上漂泊。

疍民怎么来的？有说是元末的色目人逃到海上的，元亡以后，当地人不许他们登岸，只许在水中谋生。也有说是李自成旧部逃亡闽中，自此终身为奴，成了贱民。祖祖辈辈，海上人家终于繁衍成了疍族。总之，这是一支地位低下，如同奴隶一般的族群。

疍户命运的改变，起自民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国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国民享有人身居住等自由权。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清除封建王朝留下的种种不平等。孙中山发布通令，取消对所谓“贱民”的种种限制。“若闽粤之疍户，浙之墮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及披甲为家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剃发者并优倡卒隶等，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中，一般平民尚且谈不上享受平等权利，上述种种贱民更是排除在平民之外，法律限制，社会歧视，还侈谈什么基

本权利。民国取消对所谓“贱民”的一切限制，那些长期受到国家和社会歧视的特殊群体，从此在制度上获得了平等。这不但是“贱民”的解放，也是平民的解放。共和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体——公民诞生。国民取得公民身份，政治上一律平等。尽管封建等级制度不可能由一个法令而消亡，人们的等级观念也不可能由一个法令而去除，它至少宣布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由此完成了近代平等制度、平等思想的初建，这个开端具有划时代意义。

思考冼星海的成长，这个音乐天才的成功，恰是人权平等制度的产物。

冼星海生于 1905 年，6 岁随母亲迁移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养正小学接触音乐。显然，辛亥革命废除了对疍民的限制和歧视，幼年的星海才有可能登陆上岸，走上音乐之路。冼星海 1918 年入岭南大学附中学小提琴，依然要靠卖文具书籍积攒学费、伙食费。1926 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 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20 年间等级制度、等级观念逐渐成为过去，谁还在意他的贫贱出身呢？1929 年，冼星海去巴黎勤工俭学，1931 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在巴黎，青年的星海，依旧饥寒交迫，衣食无着。小提琴协奏曲《风》就是在寒风大作、冻得瑟瑟发抖的门洞里创作成功的。以至于获奖以后，校方问他需要什么，这个贫寒夹攻的年轻人脱口而出：“饭票。”

校方并没有因为出身贫寒而歧视这个年轻人。在巴黎，校方业师青睐有加，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为日后的回国献身音乐事业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冼星海的成功，当然和他个人的天赋努力分不开。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良好的平等制度对于天才的培育更加至关重要。无论在

南洋，在民国，在巴黎，社会都秉持一个原则：在成长面前人人平等，在发展面前人人平等。民国破除了对疍民的制度性歧视，冼星海才有可能接受音乐启蒙。国际社会有教无类，并没有因为青年冼星海贫穷落魄而放弃培育，星海才有了后来的辉煌。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养护下终于横空出世。

冼星海成名之后，源源不断地创作歌颂平等、自由、进步、光明，和他的人生经历当然有密切联系。

今天想起冼星海，不为别的，环顾周围，音乐大师最痛恨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依旧根深蒂固。我们动辄听到城管殴打摊贩，电影学院学生打杀清洁工，这里面都能闻着一股强烈的职业歧视的味道。这是观念歧视。至于早年的“五类分子”子女不得上重点中学，大学优先录取贫下中农子女，入党、入团、提干、分配工作看出身，一直到眼前的城乡户籍分治，考大学两个录取分数线，这些制度性歧视也还横亘在面前。最近几年，特权横行，资本肆虐，公平正义缺席，在这种大环境里，平民的孩子，试图通过公平竞争改善境遇，获取成功，阻力越来越大。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寻常人家的孩子出路却越来越渺茫。社会堵死了底层向上流动的路径。不少人家悲观绝望，索性放弃追求努力，自甘沉沦。底层弥漫着沮丧颓唐情绪，让人想起来心情沉重。

有谁能想到冼星海是疍民？就在我搜索冼星海这个条目时，看到好几份今人转述的履历，都说他“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大家都不乐意提说“疍民”这个词了。大概是“疍民”总和贫贱联系，贫贱依然让人尴尬，让人敏感。当年冼星海能从贫贱中走出，今天我们这些享受星海音乐作品的人们，依然在为贫贱焦虑纠结。民国时代就开始呼吁的公民平等的实现，分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